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第三版)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吴承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第三版)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Zhongguo Gudai Wenti Xingtai Yanjiu

吴承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三版)/吴承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3267 - 5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文体论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199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 吴承学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267 - 5/I · 26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商: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382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序

傅璇琮

今年四月间，吴承学先生来信，约我为其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一篇序。刚看到信中所提的书名，马上就想到明代两部文体学著作，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辩》。《文章辨体》详列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散文体五十九类，《文体明辩》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当时我很担心吴承学先生如何把中国古代如此繁复、琐细的文体作统括全局的概述和分类辨析的细研呢？后来接到来稿，先翻目录，不禁眼前一亮，原来全书十七章，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别选择了先秦盟誓、谣讖与诗讖、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槩括词、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等文体进行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第十三至十六章则对文体学理论作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梳理，最后一章则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以评点形式所显示的文化传播与文化普及行为作出颇有当代意识的评议。以上章节，大部分前些年曾以论文形式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当时也读过几篇，这次为了遵嘱写序，就集中把全稿细读一遍。每读一章，说实在话，真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论议深沉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我想，书序这一文体不是书评，不必对书作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此书书前的“绪论”也已对本书的宗旨作明晰的阐释。书的序言应当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大致是撰写者的一篇读后感，可以对书作感想式的评论，也可与著者作学术上或友情上的交流，还可抒发撰序者本人的某些感慨。就我个人来说，吴承学先生比我年轻二十多岁，按照友人蒋寅先生《四代人的学术境遇》所述，在 20 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

代，承学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总有一种与吴、蒋都是同一代的感觉，因此每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谈，也无“忘年”之感。这样，我这篇序也就随意而谈，无一定之体。

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将以上的八个字、四句话，具体落实到这本书，首先我觉得承学先生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而学科建设也确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面向新世纪所必须正视和承担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项目。十年前承学先生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提出“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并写有专著，经过近几年的潜心研究，又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我认为，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说道：“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往往把文体单纯看作一种形式技巧，不予重视，这是出于一种偏重所谓政治因素的误解，从而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如果按“绪论”中所说，我们在建立文体学的过程中，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及文化心态，这就能促使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

当然，作为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有科学规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点突破的创新意识。以古代文体学而论，面对从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间几十种、上百种的文体，要一个个排着队来评述，谈何容易，这也是古代文体学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但我们可以作主观突破，这就是本书的一种创新

精神,即先不作系统的概论,而是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含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不要先做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这样难免重复、浅层;先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这就能使这一学科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具有众多坚实实验室的科学园区。

这里提到实验室,我以为人文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特色的文献材料库,而本书在这方面也颇有建设性的创新点。我在上面曾讲到学重博实,而就现代来说,博实必须注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在第一章《先秦的盟誓》中,作者表示,他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子检索系统,得知“盟”字在《左传》中出现 640 次,在《公羊传》中出现 16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 172 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 2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 1 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又,在《汉字游戏与汉字诗学》一章,作者从《诗牌谱》中摘下开头三十个字,根据北京大学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得出它们在《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天 17614, 云 19029, 烟 6176, 霞 2008, 霜 3813, 等等。这样的“总账”式数字统计,并不纯粹是技术性的,它往往会带给人们一种文化探索的兴味。我在一次会议上也曾听《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制作者说过一段话,他说他拿出“夕阳”一词,来检索《全唐诗》出现次数,结果是初唐时期最少,晚唐时期最多,说得与会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当然,对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文献材料,不能全靠电子检索,还得靠头脑积累,头脑中的众多积累和有效利用,有时是电子检索不能代替的,它的表现特点是“活”。譬如本书中讲到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戏曲、小说)的影响,就举出宋代《醉翁谈录》所引用的公案小说,元代的《陈州粜米》、《硃砂担》、《蝴蝶梦》、《灰阑记》、《窦娥冤》等十余个杂剧,明代的《包公案》、《龙图公案》等白话判案小说。又如《晚明小品》一章述及古人以本草、药方形式写出富有情趣之文,所举之例,有唐张说《钱本草》、贾言忠《监察本草》、侯昧虚《百官本草》,宋释慧日《禅门本草》,明

袁中道《〈禅门本草〉补》，清张潮《书本草》（按药方所举例，略）。这是现在电子检索还做不到的，需要我们当代学人，排除外界的诸种干扰，安心读书做学问，才能有所获得。

承学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博通中外古今，书中好几处引及现代外国的哲学、文学理论著作，如论集句时，引述俄国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美学原理；论《诗牌谱》，就随手联系西方文论中的意象研究，以美国学者华兹生对《唐诗三百首》所作统计为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晚明小品》一章中论及作者自己立名的“意象式小品”，也即一连串的意象联缀而成的小品，这些意象有时看来只是杂纂而成，而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联系，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作者写到此，特地举了现代作家汪曾祺的小说《钓人的孩子》一段描写。为提供给我们搞古代研究的人欣赏，我这里把这段美文逐录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小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甜酸苦辣咸。

这样的意象式字句，更能使人体味抗战时期昆明郊区一个普通小镇的独特景致。讲古代文体，引用现代文学创作，这不但是增加书中的文采，更使人得到沟通古今的启发。我过去在论述朱东润先生史传作品时曾提道：“朱先生的传记作品还有一种神来之笔，那就是在讲述历史时，忽然会把过去的生活拉到现代来，增进人们的时代意识与生活情趣”，并举《杜甫传论》中论及杜诗《严氏溪放歌行》，引及近代乐曲《二泉映月》，论及杜甫在江陵的遭际，联系法国雨果的小说《笑面人》（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所刊拙文《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沟通古代文学与现代创作的内在联系，挖掘我们华夏民族的潜在文化意蕴，这应当也是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命题。

我恐怕不能讲得太多，影响读者对这部佳作的研读和欣赏。我想再补充谈两点。一是作者注意过去不大受人重视的一些文体所具有的文化

内涵，强调“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如论文字僻涩的先秦盟誓，指出“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讲到具有神秘意味的谣讖和诗讖，说“它们具有某些其他类型诗歌所没有的文化内涵”；说古人的题壁、题树等题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一种寓有艺术色彩的人文景观”；讲到一向被视为政治文体的判文，说“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对一向被视为臭文的八股文，说它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影响最大的文体之一”。这样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文体的产生、演变及社会意义，确能使人扩展视野，加深思索。另一点是书中对某些流行看法和传统观点，能独出新见。如论八股文，说八股文的确影响明代文人和文学的创新精神，但又指出其理论比较复杂，对于古代文章学、技法理论产生的影响难以断然否定，并说作为科举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的确综合和融化了古代许多文体的特点”；又如这些年来备受人赞赏的晚明小品，作者在作了肯定论述外，提出其一个特点是“虽小亦好，虽好亦小”；对晚明清言，指出其思想内容的两重性：“清言所标榜的是清旷，而最终却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头。”这些都是使人惬意的中肯之论。

承学先生于四月中旬寄来此书书稿时，并附一信，信中有几句话，颇值得深思：“这里远离学术中心，在许多外地学者看来，此间不是做学问之处；而在此间世人看来，做学问乃是不合时宜之事。这两种看法都近于事实。既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也许正是这样，我的论文总是带有某种‘边缘’色彩和寂寞之音，格格不入时流。”这几句话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古代学问之人，是不能与股票“联网”，与“票房”比值的。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承学先生那样的才具气度与情含雅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

“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

关于广州的文化环境，最近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送我的一本书得到新的启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年初出版一本大 16 开本的图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书中影印了 19 世纪初期广州画铺中的画师绘制的所谓外销画，画师当时从营利出发，将各种题材的水彩水粉外销画绘制出来，销售并流传到欧美各地。这些外销画所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片断题材，而画法却模仿西方，现在看来十分别致，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情景。这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可见在鸦片战争这个被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时间点之前，广州的社会与文化风气已有一种相当西化的倾向。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是一个整体且相对独立的行动，并不完全受政治的制约和影响。陈寅恪先生早年所作的宗教史名篇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提出过一个论点，说两种不同民族的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港湾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对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这本表现广州 19 世纪初期三百六十行市井风情图集，更显得陈寅恪先生论点预测性和推导性之可贵。近二十年来广州的开放成绩显著，文化的活跃也有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吴承学先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以寂寞之心钻研其所称之“边缘”，必将是一片为人注目的学术“新境”——这，也是拙序的殷切期望之情。

2000 年 6 月中旬，北京六里桥寓舍，
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 | (5) |
| 一 盟誓制度与盟誓文体之形成 | (5) |
| 二 盟誓的体制与形态 | (10) |
| 三 盟誓研究的文化意义 | (20) |
| 第二章 论谣讖与诗讖 | (25) |
| 一 谣讖形态与讖纬之学 | (25) |
| 二 诗妖、诗异：征兆、禁忌与政治炒作 | (30) |
| 三 诗讖：心态与命运 | (36) |
| 四 谣讖说与诗讖说对于创作心态与叙事文学的影响 | (41) |
| 第三章 策问与对策 | |
| ——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 (46) |
| 一 从政务咨询到人才选拔 | (46) |
| 二 作为文章的策问 | (49) |
| 三 对策：君臣交际之始 | (54) |
| 四 对策的文体特征与局限 | (57) |
| 第四章 汉魏六朝挽歌考论 | (65) |
| 一 挽歌文体之源 | (65) |
| 二 嘉会与挽歌 | (71) |
| 三 从抒情到叙事 | (74) |
| 四 从悼人到自挽 | (78) |

| | |
|------------------------|-------|
| 第五章 诗可以群 | |
| ——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 | (83) |
| 一 唱和:交际与交流 | (83) |
| 二 公宴:“嘉会寄诗以亲” | (87) |
| 三 探题赋韵:集体性规范 | (90) |
| 四 赋得:“诗徇乎物” | (94) |
| 五 联句:集体性形态 | (98) |
| 六 文体形态:观念的载体与文化的意蕴 | (101) |
| 第六章 六朝的忏悔文与杂体诗 | (105) |
| 一 忏悔文:从自省到忏悔 | (105) |
| 二 杂体诗:汉语“诗性”的形式实验 | (112) |
| 第七章 论古诗制题制序史 | (117) |
| 一 魏晋:从无题诗到有题诗 | (117) |
| 二 唐宋诗题:从规范到多样 | (124) |
| 三 诗序:诗题的补充 | (130) |
| 四 诗题与诗序:古诗演变之迹 | (134) |
| 第八章 论题壁诗 | (138) |
| 一 题壁诗源流 | (138) |
| 二 相关的创作与传播形式 | (141) |
| 三 传播与传世 | (145) |
| 四 题诗与文人之生活和创作 | (148) |
| 五 题诗与大众之接受和传播 | (153) |
| 第九章 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 (157) |
| 一 判与唐代的选士制度和文化风气 | (157) |
| 二 唐判的体制 | (163) |
| 三 判体之流变及对叙事文学文体之影响 | (172) |
| 第十章 集句论 | (180) |
| 一 集句诗之源流 | (180) |

| | |
|-----------------------|-------|
| 二 其他集句文体简述 | (189) |
| 三 集句:独特的体制与风味 | (194) |
| 第十一章 论宋代槩括词 | (200) |
| 一 宋代槩括词之兴 | (200) |
| 二 槩括与帖括 | (204) |
| 三 槩括:非原创性的另类创造 | (207) |
| 第十二章 评点之兴 | |
| ——论文学评点的起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 (216) |
| 一 评点的学术渊源 | (216) |
| 二 南宋诗文评点举要 | (225) |
| 三 刘辰翁:第一位评点之集大成者 | (231) |
| 四 圈点的符号意义与评点的文化意味 | (234) |
| 第十三章 明代八股文 | (239) |
| 一 从八股文起源诸说看其文体特点 | (240) |
| 二 八股文之形成及基本结构 | (251) |
| 三 八股文形态举例 | (266) |
| 四 关于代人立言 | (272) |
| 五 关于守经遵注 | (280) |
| 六 关于八股文的语体 | (283) |
| 七 八股文及其理论与文学创作 | (291) |
| 八 八股文对明人心态之影响 | (300) |
| 九 关于对八股文的评价 | (309) |
| 第十四章 论“序题” | |
| ——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的定名与考察 | (314) |
| 一 关于“序题”的定名 | (314) |
| 二 文体序题的产生与兴盛 | (318) |
| 三 序题作为批评文体的特点 | (326) |

| | |
|----------------|-------|
| 第十五章 晚明小品 | (330) |
| 一 从六朝小品到晚明小品 | (330) |
| 二 在载道与法度的古文之外 | (336) |
| 三 意境的营造 | (339) |
| 四 本草药方妙成文 | (345) |
| 五 意象体小品 | (352) |
| 六 世俗的雅化 | (358) |
| 第十六章 论晚明清言 | (362) |
| 一 清言之盛 | (362) |
| 二 浊世清梦与“务讲禅宗” | (364) |
| 三 生活艺术化与“矫言幽尚” | (369) |
| 四 幻灭感和末世味 | (373) |
| 五 清言的文体与语体 | (375) |
| 第十七章 文字游戏与汉字诗学 | |
| ——《诗牌谱》研究 | (381) |
| 一 《诗牌谱》及编者 | (381) |
| 二 《诗牌谱》的内容与规则 | (383) |
| 三 汉字特性与诗学 | (388) |
| 四 从《诗牌谱》到集字诗 | (393) |
| 附录 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 | (399) |
| 引用书目 | (404) |
| 后记 | (423) |
| 第三版题辞 | (425) |

绪 论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的演变史。

文体学研究,既是古老的课题,也是崭新的学术领域。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19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重点不断在变化。新时期以前,文学研究明显带有政治化的倾向;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古代文学研究在突破旧研究范式束缚的同时,又比较强调宏观的研究,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虽然也取得不少实绩,但对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本体的研究还是非常不足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中,对于文体形态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近年来,文体形态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出版了不少文体研究专史与论文,对各种文体形态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文体学理论也出现一些可喜的成果,文体学研究成为新近学术热点之一。

我以为,文学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史学、哲学的区别,在于其鲜明的文学性,这是文学史学科的本质所在,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而文学形式则是文学性的重要方面。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